



第五册

高中语文教材新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中语文教材新探

第五册

本社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中语文教材新探

第五册

本社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0千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统一书号: 7243·434 定价: 1.25元

编者的话

语文教学是一项艰苦繁重的劳动，它肩负着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为“四化”培养人材的重担。因而要求教师指导学生阅读文质兼美的文章、掌握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发展智力，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为此目的，广大中学语文教师乐于教学、循循善诱，认真备课，批改作文，夜以继日，不辞辛苦。他们的工作，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鉴于语文教师备课资料不多，查找困难影响教学。不少语文教师，或给我社来信，或亲临我社提出意见和建议，希望我们继续出版有关中学语文教学的书籍，以补备课资料的不足，从而节约时间，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编辑成册的。应该说这本书里凝聚着语文教师的晶莹汗水，是他们劳动的果实。

《高中语文教材新探》第五册的篇数与现行全日制高中语文课本第五册一致，并依照课文的顺序，对课文逐篇进行研究与探索。

“语文教材新探”不同于“语文讲析”，也不同于“语文教案”。“讲析”着重于文章的分析。“教案”着重于教学方法的说明。本书有三层涵义：

一、“新探”着重于课文的深入研究。从课文的形式到课文的内容，既注重语言文字的分析，又注重文学史和文学

理论知识的阐明，有一定的深度，力图有所探新。

二、“新探”里不少文章，除有撰稿人对课文的分析外，还有对同一课文不同见解的引证：有语文课本及“教学参考书”未收进的字、词、句、篇的补充注释和有关参考资料摘要；资料比较广泛充实。

三、“新探”的体例、格调多样。在全书统一宗旨的规范下，自由行文，各抒己见，重点突出，特色鲜明，既尊重作者的劳动，也很符合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要求。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本市许多语文教师的热情支持。他们为本书提供稿源、推荐作者。时雁行、张必铤同志阅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对关心、支持本书编辑工作的同志，深表感谢。

由于我们人力有限，教学经验不足，教育理论水平不高，书中尚有若干有待完善的地方，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982年10月

目 录

一	范爱农.....	(1)
二	爱国学者顾炎武.....	(13)
三	山地回忆.....	(20)
四	书塾与学堂.....	(32)
五	雷电颂.....	(45)
六	诗二首	
	静夜.....	(60)
	春鸟.....	(63)
七	小二黑结婚(上).....	(70)
八	小二黑结婚(下).....	(77)
九	夜.....	(87)
一〇	穷人的专利权.....	(97)
一一	林黛玉进贾府.....	(107)
一二	语言的演变.....	(120)
一三	我国古代的车马.....	(130)
一四	灯.....	(140)
一五	散文两篇	
	丑石.....	(149)
	菱角.....	(153)
一六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58)
一七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167)

一八	杂文两篇·····	(179)
	文学和出汗·····	(180)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84)
一九	唐诗二首	
	行路难·····	(190)
	兵车行·····	(196)
二〇	宋词二首	
	雨霖铃·····	(204)
	扬州慢·····	(209)
二一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216)
二二	齐桓晋文之事·····	(226)
二三	殽之战·····	(239)
二四	伶官传序·····	(248)
二五	过小孤山大孤山·····	(254)
二六	项脊轩志·····	(262)
二七	报刘一丈书·····	(274)
二八	复庵记·····	(282)
二九	治平篇·····	(289)
三〇	《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298)

一 范 爱 农

(一) 写作背景

《范爱农》是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最后一篇，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篇：它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鲁迅前期的战斗的思想倾向。

《朝花夕拾》共收散文十篇，全都写于一九二六年。

这一年，是我国社会将要经历重大变革的一年，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局面已经形成。在北方，段祺瑞反动政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使自己处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之中；各派军阀不停地混战，政局日趋黑暗。在南方，以广东为根据地的革命运动正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这年七月，北伐战争的序幕拉开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和骨干的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地向北推进，不到半年时间，就歼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六省。局势中的这些重大变化，促成了全国人民革命情绪的新高涨。

这一年，鲁迅的战斗经历也是不寻常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反动政府曾准备通缉当时北京文教界人士五十人，鲁迅也名列其中。据《鲁迅日记》，从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初，他曾数次避居山本医院、法国医院、德国医院等处。后来在北京实在呆不下去，恰好林语堂来信约他到厦门

大学任教。由于深受南方革命形势的鼓舞，鲁迅欣然应允，于八月二十六日离开北京，九月四日抵达厦门，在那里一直住到第二年一月十五日。在这期间，特别是在北京那几个月，尽管生活很不安定，鲁迅仍然写了不少杂文，对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帮凶即“现代评论派”的卑劣凶残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这些杂文后来都收在《华盖集续编》里；在厦门大学任教时，他还写了《奔月》和《眉间尺》（后改名为《铸剑》），借改写古代故事歌颂了当代革命者追求光明的意志和战斗反抗的精神，这两篇作品后来收进了《故事新编》。

《朝花夕拾》是跟上述作品同时产生的一部回忆散文集。鲁迅在这部集子的《小引》中不无感慨地写道：“……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历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工房；后三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鲁迅在这艰难的环境中之所以要写下那些发生在十多年乃至四十年前的往事，决非偶然。虽然其中也不乏欢乐的篇章，但更多的却是对封建社会各个侧面的描绘，从它的愚昧风习、落后的教育方式直至封建阶级的腐朽思想。这说明鲁迅有感于封建社会黑暗的浓重，因而倾其全力来进行揭露。这种揭露的力量在于作品内容的真实。在作者娓娓动听的叙述中，人们不仅会觉得那些“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人和事历历如在眼前，而且会感到封建社会阴影的存在。至于在这揭露过程中偶尔借题发挥，对“现代评论派”施以反击，更显示了作者斗争方法的巧妙。

《朝花夕拾》中的十篇散文是按写作时间的顺序编定的，从这一面看，《范爱农》一文的写作似无深意，但鲁迅以此来

结束他，的回忆却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范爱农是一个向往革命、追求光明生活而又被封建社会的浓重黑暗所吞噬了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他的悲剧是社会悲剧。作者是怀着彻底改造旧社会，使这样的悲剧不至重演的心情写下这篇作品的。也许这不是一种巧合：鲁迅写这篇作品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两个月后，即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他踏上了广州的土地，从此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的战斗。

（二） 课文分析

1. 作品的构思

《范爱农》的艺术构思有其独到之处。如果拿这篇作品跟同集中的《阿长与山海经》和《藤野先生》作一比较，便会看出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传记的色彩——它所截取的几个片断足以概括人物的历史。但从根本上说，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传记：它所采用的是主观叙述方式，而不象一般传记那样只对事实作客观的叙述；它的线索是“我”和人物之间的交往，而不单是人物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样写，才便于作者抒发对人物的感情，并表明他由人物的命运而引起的深沉思考。

据课文所述，除了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短时期而外，鲁迅跟范爱农的过从不算密切，甚至还有过隔阂，但这个人的悲剧命运却在他的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鲁迅日记·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九日》中，有这么一段话：“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失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如此抒情语在鲁迅日记中是很少见的，于此可见在闻讯的当时其感情的沉痛。三天后，在雨夜中鲁迅又写下了

著名的《哀范君》三章，进一步抒发了他的悲愤之情。从诗中可以看出，他那时就已经怀疑范爱农是自杀的，并认为这是一场社会悲剧，因为范爱农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黑暗现实极为不满，他看不惯那“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局面，而在“寒云”和“凛夜”的重重包围之中，很可能只剩下唯一的出路，“独沉”于“清冷”之水。鲁迅的这些看法也同样反映在《范爱农》这篇散文中，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四年。

《范爱农》的构思在一个基本点上跟《哀范君》是相同的：都是把范爱农的悲剧命运放在鲜明的历史背景上来加以描绘。但散文毕竟不同于诗歌，在《范爱农》里，作者所展示的是一幅幅有历史连续性的生活画面，并结合着人物对现实问题的态度写出了一系列性格化的细节——这些都是在《哀范君》里所看不到的，对再现人物悲剧历史的发展过程，具有很大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这篇散文的字里行间不时地流露出作者的抱憾心情，这是鲁迅自我剖析精神的反映。

附带说明一下：有的资料上说范爱农的确是“落水而死”，而不是自杀。从这一点来解释作品，就会降低这篇作品的意义。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已经指出，他的这些散文都是“从记忆中抄出，容或与事实有出入，但我想它们是这样的”。我们探讨《范爱农》的艺术构思，只能从作者的思想实际和作品的实际内容出发。范爱农是否真的“落水而死”，是艺术构思以外的问题，这判断要留待将来的考据家去做。

2. 作品的结构

上文已经提到，这篇作品的线索是“我”和范爱农之间的交往，这是笼统的提法。说得具体些，还应看到下列两种

发展过程：一种是作者对范爱农的感情的发展过程——由产生误解、消除误解到日益亲密；一种是范爱农的命运的发展过程——由在黑暗的现实里挣扎到革命后的暂时兴奋，尔后又回到黑暗的现实，终于导致悲剧性的死亡。这两种发展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显示了“我”和范爱农之间的交往的特点。按照它们进行的程序，可将本文划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由开头到“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写在东京时的一次同乡会上“我”和范爱农发生争执的情形。先说明这次争执的背景：东京的留日学生从报上看到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擒的报道，接着又传来秋瑾被杀害、徐锡麟被挖心的消息，“人心很愤怒”。然后着重叙述绍兴同乡会开会的经过：鲁迅坚决地主张发电报，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范爱农则坚决反对；待到通过发电报之后，范爱农则针对鲁迅提出，电文应由“主张发电的人”来拟，鲁迅也针对范爱农提出，电文应由“深知烈士生平的人”来拟。这两次“争执”是本部分叙事的重点，但这并不说明双方有原则性的分歧，实际上是双方都存在着偏见。由此造成悬念：这偏见后来消除了没有？怎样消除的？本部分的最后，作者以“离奇，而且很可恶”概括了他对范爱农的初次印象。

第二部分（“然而这意见”到“谁知道呢？你问她去”）写“我”和范爱农在故乡重逢后日益相熟的情形。开头略叙重逢时的情景、范爱农的穷困生活和此后双方的交往。接着插入一段旧事，详细地说明了范爱农对“我”产生偏见的原因。这段旧事是作者用回忆的方式说出的，其中大有深意。

第三部分（“到冬初”到“还怕要被禁止的”）写绍兴光复后的复杂局势和范爱农对辛亥革命由热诚欢迎到失望的

变化过程。开头略写绍兴光复后范爱农的振奋心情和工作的勤快，也捎带说到绍兴军政府内部的腐败情况，为下文写“报馆案”埋下伏笔。接着就来详叙“报馆案”的始末，从筹办经过，一出版就大骂王都督，王都督派人送款，受款后仍继续骂，直到“被一群兵们捣毁”；此外还有一个颇为滑稽的尾声：在报馆被捣毁过程中受了伤的孙德清脱下衣服照相，并做文章“宣传军政府的横暴”。这番叙述看来颇似“闲笔”，实际上却很关紧要——革命后的军政府居然如此腐败，怎能不叫人失望呢！在这番叙述中插入的范爱农劝“我”去南京的话，画龙点睛地说明了他的失望情绪之重，这正是他的悲剧性结局行将到来的征兆。

第四部分（“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到文章结尾）写范爱农的悲剧结局和“我”的沉痛心情。这个部分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补叙别后三个月中范爱农的穷困景况和“落水经过”；二是“我”怀疑范爱农是自杀；三是表述“我”的悲痛心情。这三方面内容是统一的：补叙别后景况是为了进一步说明范爱农不为世所容，是他自杀的主要原因；正因为范爱农是自杀而死，其结局尤其足悲足愤。这极度的悲愤是本部分的基调，也是全篇抒情的高潮点，集中表明了作者写作此文的意图。此外，本部分也有一段尾声，叙述朋友们为范爱农女儿筹集学费而未成的大致经过，这里面则充满了世态炎凉之感。

这样一个布局是很严谨的，它把各种零碎的材料巧妙地联成了一个整体，不仅很好地概括了范爱农一生的历史，而且使这一悲剧人物的形象在真实的历史背景烘托下，显得格外鲜明。

3. 范爱农悲剧的社会意义

本文第四部分开头已经提到，“我”在听到范爱农死讯的当时就“疑心”他是自杀的，“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在补叙中说的“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以及“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这些话也带有明显的倾向；最后更意味深长地说：“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这一切都表明“我”始终没有排除他的“疑心”。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才能深刻理解范爱农悲剧的社会意义。

这一悲剧的实质在于：范爱农是一个正直、高傲、有着追求光明希望的知识分子，但他的正直高傲不为黑暗的现实所容，他的追求光明的希望也在辛亥革命这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化为绝望。毫无疑义，这样的悲剧正是社会悲剧。

文章的前两部分着重刻画范爱农的性格特点。从反对拍电报一事可以看出他是有独立思考的，决不轻易附和别人的主张，但既然多数人主张拍，他仍然“屈从”了，并不诚心作对。至于对“我”的冷语相讥以至两次发生争执，则反映了他的高傲性格，这是因为他初到日本时看到了“我”的“摇头”，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但这争执特别是第一次争执，毕竟是在反对满政府这个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的看法不同，其中也多少有点“少年气盛”的味道，待到事过境迁，也未尝不知道是自己一时的偏见——从后来他直率地对“我”说出他“一向就讨厌”的原因便看得出来。因此，几年后当两人在故乡重逢时，便出现了那“互相的嘲笑和悲哀”的一幕。这“互相的嘲笑和悲哀”是他俩友谊的开始，表明了相互的理解，因为他们的境遇相同，都是在黑暗现实的重压下未能实现自己的改革愿望。于是他向“我”谈起了后来不能继续留学的

原因和回乡后受到的“轻蔑，排斥，迫害”，这后一种情形既说明了故乡的黑暗，也反映了范爱农的不苟合于世的性格。但自那次跟“我”重逢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因此“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而且在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将来的希望。文章中这样来描写范爱农的性格特点，给人一种感觉：如果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中，他会成为一个热情奋发、积极有为的人。

后两部分则着重说明范爱农悲剧的发展过程。一开始就写革命初期的范爱农——这是真正的范爱农。在绍兴光复的第二天，他就进城来看光复后的景象，脸上出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笑容；在担任师范学校监学以后，“他办事，兼教学，实在勤快得可以”。显然，这时的范爱农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然而新成立的军政府照旧腐败，在“我”接到季蕸催赴南京的信时，他不禁凄凉地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他变得消沉了，而在他的“无声的话”里则包含着对现实的抗议。此后，“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牢骚也多；他寄希望于“我”能在北京为他谋事，却又“没有机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从希望的高峰上跌落下来，“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悲惨地死去。

范爱农的悲剧，归根结底，是由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的。从绍兴光复后所组织起来的军政府来看，“内骨子是依旧的”，“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局长……”，这样的军政府只能是剥削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决不能指望它来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而王金发到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衙门里的人物，

“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这说明革命党人不仅向封建势力妥协了，而且沾染了它的腐败习气。至于后来王金发们派人向报馆行贿，贿赂不成又继之以派兵捣毁的做法，那就不止是腐败，而且是倒退了。生活在如此复杂险恶的环境中的范爱农，他所感受到的现实的压力比起革命前还要重些，失望也更深，这就必然要导致悲剧性的结局。跟阿Q的命运一样，范爱农也是这次不彻底的革命的牺牲品，所不同的是，阿Q是不自觉地被处死的，而范爱农则是在已经感到“端无生理”的时候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同时，由于范爱农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悲剧也许更具有催人泪下、发人深思的作用。

4. 鲁迅的自我剖析精神

本文以叙事为主，而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挚动人的感情。说过它真挚，是因为作者处处都按照自己和范爱农的特殊交往过程写来，既写了对朋友的爱和关切，又毫不掩饰彼此间曾经有往过的误解，而他的严肃的自我剖析精神也在这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在叙述东京的那次同乡会时，作者坦率地说出了在听到范爱农那“钝滞的声音”后的感情状态：“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但这也仅仅是轻蔑，而会后，当他想到“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时，简直是把范爱农当作敌人对待了。作者把这些一时间的偏激想法写了出来，是含有自责的意思的。后来，他们旧事重提，作者回忆起自己的两次“摇头”，又写下了一段深沉的话：“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

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应当指出，作者的“摇头”虽出于偏见，却并非有意显示自己的轻蔑，而是在“不注意”之中做出来的。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毫不宽恕自己，于是历数了值得自己尊敬的人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以此来表达他的惭愧之情。

在范爱农去世十四年后，作者重提自己年轻时代这些令人悔恨的往事，说明他严于自责，也使人愈觉悲痛。

5. 写作特点

(1) 白描手法：文章直接描写范爱农的话语不算很多，但这个人物却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这是因为作者善于运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真实地写出人物的风貌。例如“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一下子就抓住了范爱农的外形特征，也显示了他的高傲性格。又如“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这话里饱含着范爱农的悲愤，也表现了他的深沉思考，不愿附和别人；“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这表示了明显的讥讽；“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这说明范爱农是多么盼望开始新的生活。对朋友又寄予了多么热切的希望，这是他最后凄苦生活中的唯一安慰。还有一些细节，话语很平常，然而内蕴极深，例如“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这说的是生活中很平常的事，但结合当时范爱农和作者的境遇来看，却明显地表示着他们——主要是范爱农的压抑心情；后来绍兴光复，范爱农一见作者就说：“老迅，我们今